

世界華文文學研究書系（之三）

臺港暨海外 華文文學論集

施修蓉 / 著

世界華文文學家協會出版社



世界華文文學研究書系（之三）

臺港暨海外華文文學論集

施修蓉 著

世界華文文學家協會出版

◇ 世界華文文學研究書系 ◇

總編：王一桃（香港）
主編：忠揚（新加坡）
監印：夏濃（香港）



世界華文文學研究書系（之三）

臺港暨海外華文文學論集

ISBN: 988-97663-2-9
版權所有 · 請勿翻印

著者 / 施修蓉
出版 / 世界華文文學家協會
香港九龍洗衣街七十號十樓A座三號
電話：00852 2391 0255
發行 / 利通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紅磡民裕街凱旋工商中心八樓C座
電話：00852 2303.1010
印刷 / 鑫寧彩色印刷廠
版次 / 公元2004年10月第1版
定價 / 港幣50元

目 錄

第一輯 作家作品論

共同的守望

- 《送報伙》和《四世同堂》藝術視角比較 ……3

鄉國時時夢里還

- 論臺灣鄉愁詩的思歸情潮……………15

在追尋中鑄造自我

- 論臺港暨海外華文女作家散文藝術……………27

白先勇小說的對比藝術…………… 37

兩種文學形態的互補和并存

- 淺論香港文學……………46

胸藏民族氣節 文蘊時代風雲

- 桂林抗日文化城前後的曾敏之……………57

心靈規範的展示

- 讀王一桃謳歌「神舟五號升空」詩作有感……………73

健筆潑墨 剛柔互動

——忠揚《潑墨集》批評風格探奧……………77

圖文并茂皆緣情

——淺論林海音《剪影話文壇》……………82

第二輯 詩文賞析

醇厚的鄉情訴說

——羅蘭《北戴河的日子》賞析……………93

曲折 委婉 豐盈

——張秀亞《杏黃月》賞析……………98

傳統文化承傳的深情呼喚

——趙淑俠《耶誕節·舊曆年·鄉愁》賞析……………102

老梅的風采

——讀孟瑤的《一株老梅》……………105

人在旅途望清泉

——讀于梨華《親情·舊情·友情》……………109

為名人傳神寫照的出色素描	
——林涓《她的心永遠年輕》欣賞·····	115
一份明明白白的真情	
——三毛《背影》賞析·····	118
借虛寫實 語深筆曲	
——讀張曉風《有些人》·····	122
寓精深於質樸	
——讀洪素麗的《瓷碗》·····	126
赤子詩魂	
——王一桃《天堂裏的天籟》賞析·····	130
適度的印象抒寫	
——戴小華《松花江的神奇》欣賞·····	134
從知識女性到乞丐的變異軌蹟	
——聶華苓《人，又少了一個！》賞析·····	139
她的中國心	
——讀農婦的《西風寄語》·····	144
聖潔的悼母曲	
——讀林文月的《白髮與臍帶》·····	149

附 錄

一桃与眾秀

——作客香港文藝家協會……………152

真情 真知 真像

——讀覃盛發的《王一桃語言藝術魅力》……………157

參考文獻……………160

後 記……………161

第一輯 作家作品論

共同的守望

——《送報伙》和《四世同堂》藝術視角比較

—

《送報伙》和《四世同堂》是日寇侵華時期楊逵和老舍向日本侵略者投擲的兩根鋼戟。它們分別發射自臺灣和北平，一南一北，相互呼應，以強大的合力刺穿侵略者的嘴臉，同時其特有的顛響也震撼著中華文苑和國人的心靈，是抗戰文學史上不可多得的小說佳作。各居海峽兩岸的楊逵和老舍，出身、經歷、稟性、藝術氣質和審美志趣差異頗大，是共赴國難的守望情結和「為人生而藝術」的使命感，讓他們聚首在抗日文學戰壕，操作同一話語，一起在破碎的山河大地上大書「民族·國家·人民·正義」這八個醒目的大字，齊奏中華民族反侵略、反壓迫、民族自尊自強的讚歌。

楊逵的《送報伙》最初發表於 1932 年的《臺灣民報》，是由臺灣新文學先驅賴和推介的。由於後半部被日本總督府勒令腰斬了，實際上在臺灣發表的只是小說的前半部，直到 1934 年，日本的進步刊物《文學評論》才用日文全文刊出該小說，1935 年胡風將它譯為中文，首次在大陸發表。老舍的《四世同堂》由《惶惑》、《偷生》《饑荒》三部組成，分別發表於四十年代中後期和五十年代初。這兩部小說不僅為中國人民所歡迎，在日本的反響也十分強烈。日本的《文學評論》在當年給《送報伙》評了二等獎（一等獎缺）。1951 年《四世同堂》譯成日文後，立即在日本「成為暢銷書」，許多日本學者認為這是「全日本人必讀的書」，是「戰爭反省教科書」^①。兩部小說深刻的思想力量和強烈的社

會效應，表明楊逵和老舍的文學書寫絕對不是那種遊離於社會、歷史、時代、政治之外的「純文學」操作，其小說的社會學、美學價值恰好就體現在「非文學」之中。兩位作家之所以受人敬重，就在於他們在國破家亡的非常時期，自覺地以文學的形式關注文學以外的問題——關注屈辱的歷史、沉重的現實和茫遠的未來；關注淪陷區中國人的生存環境和心態；關注被奴役者如何擺脫苦難獲得拯救。作為「關注」的主體，楊逵和老舍給自己以正確的定位：首先是反侵略的鬥士，是虔誠的愛國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然後才是作家。作為鬥士，他們視抗日為首務，以文學為武器，張揚正義，「改寫被歪曲的歷史」，捍衛民族的尊嚴；作為作家，他們擇現實主義之路前行，揮舞鋼戟，兩面出擊：一方面「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直面慘澹的人生」，逃避現實、遁入虛無是他們最不齒的；另一方面，他們向著民族靈魂深處探索、剖析，努力弘揚和剔除民族文化傳統中的正面與負面因數。在「國土日蹙、社會動搖、變化無端、恍如惡夢」的現實面前^②，他們不肯放棄作家的良心，「以血淚為文章」，「為正義吶喊」。支援他們在逆境中不屈不撓、挺身疾走、昂首呼號的動力來自何處？可以斷言，它來自縈繞、鬱積於作家情感世界深處的一種情結——守望情結。

二

守望情結，對於楊逵和老舍，不僅是個體生命的精神體驗，更是整個中華民族在抗敵禦侮的特定時空中的生命形象和心理狀態的獨特抒寫。因此，其內蘊是豐富而深刻的。首先，它是共赴國難、守土有責的憂患意識的表現。國土被蹂躪，家園遭汙穢，只有用熱血驅逐惡魔，用正義之火燒淨卑污與殘暴，才能重整山河；有抵抗，因為有憂患，意識到憂患，才會有對入屋搶劫的強

盜所生的憎恨、鄙視和排拒。總之，自衛、自尊、自強的民族精神是由憂患意識所催生的，整合這三者的憂患意識就是守望情結的核心。這種憂患意識來自歷史深處，來自華夏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脈之中，躍動的是中華優秀文化傳統的精魂。楊逵和老舍自覺地繼承這一傳統，並以鮮明的人生理想使之煥發革命、科學、民主的現代光彩，並與抗日時期那種舉國抗倭、同仇敵愾的時代情緒相呼應。因此，以憂患意識為核心的守望情結，不僅是對「皇民化」統治的抵制與抗議，更是對中華民族身份、民族精神的堅守。《送報伙》和《四世同堂》的感人力量，首先在於真實揭露敵人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多方面的侵略罪行與本質，撕下它們「共存共榮」面目掩蓋下的強盜嘴臉，使世人警醒；同時，還熱情地謳歌了被壓迫族群中逐漸滋生、擴大、豐滿的憂患意識，彰顯了他們脫出被奴役的舊軌以鮮血和生命去抗爭的生命形象。《送報伙》中楊君一家，原是勤勞本分而又殷實的農戶，日本制糖公司利用殖民者的政治特權，強行吞併了他們的土地，楊君父母雙雙被逼死，兄弟姐妹各散西東，楊君隻身流落東京街頭，想靠打工苟活。然而，這最低的要求也難以達到。楊君在日本又跌入了派報所老闆設下的騙取保證金的陷阱，「走投無路」就是他唯一的出路。從臺灣到日本，一步一串血印，步步均無活路，這一慘痛經歷使他逐漸意識到，與其屈辱地苟活，不如以生命相拼搏踏出生路。最終，在民族意識和階級鬥爭意識的啓發下，他擡頭挺腰，和日本工人一起加入向資本家抗爭的行列。小說以楊君命運變遷為主線，從一個非軍事側面揭露日本侵略者經濟掠奪的行徑與野心，徹底扯下他們高幟的「日臺平等、東亞共榮」的遮羞布。因此，這篇小說的史實資料價值和文學價值都不容低估。

《四世同堂》描寫了蘆溝橋事變不久，平津相繼失陷，日寇在北平建立各種反動組織，採取一系列法西斯手段實行野蠻統治

的黑暗現實，真實再現了生活在亡國之痛陰霾下的北平市民由惶惑矛盾到深沉反思，最終複歸憂患意識的艱難覺醒過程。在這兩部小說中，很多「點睛之筆」往往集中在「覺醒」和「自尊」的情節和場面上。請看下面兩處描寫：

「幾個月後，在我和日本朋友的努力下，把我趕出來的那個派報所裏終於出了『亂子』。看到面孔紅潤的擺架子的××派報所老闆在送報伙的揭發下被繩之以法而低下了蒼白的臉，那時候我的心跳了起來。」

（送報伙）

「因為餓」，祁瑞宣的女兒小姐「看起來，她已經半死不活了。」

「她說不吃共和麵的時候，那眼神彷彿是在對家裏人說，她那小生命也自有它的尊嚴：她不願吃那連豬狗也不肯進嘴的東西。……她眼睛裏的憤怒，好像似代表大家表達了對侵略戰爭的憎恨。」

（四世同堂）

兩位作家脫除了一切俗套和公式，以平民化的視域，寫普通百姓，執著地為掙紮在日本侵略者淫威下的楊君、祁瑞宣、祁妮子等人塑像。這些普通百姓「位卑未敢忘憂國」，或高傲地站起來，或寧死也要保住尊嚴，不僅在精神上複歸了憂患意識，而且在思想上、行動上也理解並實踐了這一民族精神的真義。他們的行動說明：戰爭的偉力也深藏於上不見經傳的普通民衆之中，他們也是奔湧著的抗日大潮中不可或缺的一層浪花。正是這兩部作品藝術書寫上的平民化視角，使其藝術真實價值高出於其他同類題材作品。

其次，「清肌」意識也是守望情結的重要構成元素。清肌者，清除人肌體上不健康的構件也。對作家的創作來說，清肌就是對民族文化精神、民族性格、民族心理深層探索與剖析的過程，實

質是對民族自身肌體、血脈是否健全充沛的關注和呼喚：弘揚民族文化傳統中的積極因素，剔除民族性格中負面基質。《送報伙》和《四世同堂》的警世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作品十分真實地描寫了戰爭之初，被奴役者惶惑、苟且與麻木。楊君初到東京，爲了生計，他逆來順受，整天猶如屠刀下的小羊，除了「吃驚」、「膽怯」，就是「含著淚」哀求屠夫樣的老闆可憐。曾幾何時，楊君從民族矛盾和階級對立的現實中看清了日本老闆「咬住我們，吸盡了我們的血」的豺狼本性，覺醒了的他終於理直氣壯地和老闆進行了面對面的鬥爭。老舍對淪陷了的北平市民在抗戰初期留戀舊傳統，無法識大局，不敢反抗的描寫更令人震撼。小羊圈胡同的人們，由於長期受封建文化傳統的薰染，大多只顧「守著家」而「忘了國」，北平的淪陷，在他們看來最多三個月就「沒事了」。古稀之年的祁老人甚至荒唐地認爲，日本侵略中國是因為看中了蘆溝橋和橋上的石獅子。祁瑞宣知書達理，多次下了殺向抗敵戰場的決心。然而，他始終還是陷於「家」和「國」難於「左右擺勻」的矛盾痛苦之中。……日本強盜的暴行，從反面教育了小羊圈的人們，在血與火的鬥爭中，他們逐漸蕩滌了精神上的污垢，或快或慢地在亡國苦水的熬煎中逐步覺醒了。表面上，無論是楊君，還是祁瑞宣們，都未經歷戰場的廝殺，都毫無英雄氣概，但最後都成了勝利者。根本的原因是他們在淪陷區的日常生活中，用民族戰爭之火，燒掉了肌體上的腐質與軟骨，面對最冷酷最慘烈的屠殺和折磨，他們最終挺直了民族的脊梁，沒有下跪，沒有死絕，周身散發著漢柏秦松的骨氣，映照出商彝夏鼎的精魂，誠如胡絮青、舒乙在《破鏡重圓》中所說的那樣：

民族，帶著鞭痕，悲壯地生存著。

國家，帶著創傷，驕傲地屹立著。

人民，帶著鮮血，頑強地站立著。

正義，帶著它的莊嚴、神聖和人道，光榮地戰勝

了邪惡、侵略和野蠻。

兩位作家都不諱言民族性格的弱點，敢於剔除傳統文化中的負面因素，藝術地還原了在炮火鍛造中民族正氣不斷張揚的真貌，亮出了現實主義作家特有的嚴肅、真實的風範。

在楊達和老舍的意識裏，守望家園，抵抗侵略，並非是不分好壞、不辨忠奸、僅論輸贏的簡單打鬥，更不是頭腦簡單的狹隘民族主義者的單幹。他們認為，抗日是一個長期持久的戰爭過程，它需要愛國主義精神的支撐，更需要國際主義思想的滋養。

《送報伙》和《四世同堂》的很多閃光之處，正是由那些放射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光芒的描寫組成的。無獨有偶，兩部作品的結尾部分都寫到了被奴役的中國人民和日本的反戰者「朋友」般地攜起手來的情節：楊君的日本朋友佐藤動情地說：「好，讓我們攜手吧！使你們吃苦也使我們吃苦的是同一類的人！」小羊圈胡同裏住著一位日本老太太，是一個日本反戰者，瑞宣稱她「是咱們的朋友」……。這些妙筆，可謂「價值無窮」^③。如何解釋不同作家不同創作文本上的相同妙象呢？結論只有一個：兩位作家的胸懷心氣相通，藝術審美理想一致，因為他們是同種同文，承傳同一文化傳統的中國人。

三

日寇的入侵，將中國推向亡國滅種的嚴重時刻，入侵者以最新式的武器，配置著最殘暴的心理和行爲，要將中國大地變成焦土，使億萬人民淪為奴隸。多難的時代向文學提出了一個神聖的使命：「對國內，我們必須喊出民族的危機，宣佈暴日的罪狀，造成全民族嚴肅的抗戰情緒生活，以求持久的抵抗，爭取最後的勝利。對世界，我們必須揭露日本的野心與暴行，引起全人類的正義感，以共同制裁侵略者」^④。楊達和老舍不愧為民族的脊梁，

他們一致用自己的作品實踐「抗日救國就是一切」的崇高使命，為那個大時代畫像。那種視文學為發泄個人愁苦、或為宣揚理念之工具的淺俗之論，和他們的創作原則是不相容的。細讀他們的小說，我們首先感受到的是作家創作的虔誠、錘煉的耐心和藝術眼光的清新。從藝術整體構思看，他們不從俗流，獨抒懷抱：寫大時代的小人物，從小人物以見大時代；從百姓的悲歡，映現民族的苦難。藝術技巧上，以深邃的目光，捕捉個性的形象：寫具體的生命形象，寫善惡相克、愛恨交織、悲歡流變的人性；以樸素的技巧敘事描狀，不炫耀、不誇飾，蘊含著厚重的現實主義魅力。

《送報伙》和《四世同堂》取材敘事上的大寫實風格十分鮮明。他們自覺地將藝術觸角置於抗日的大時代之中，寫他們熟悉的淪陷區的普通百姓的生活和命運，寫他們在野蠻取代理性、奸殺成為光榮的國破家亡過程中的悲憤心史。這種取材角度並非作家刻意為之或苦心搜求，是他們藝術地利用自己厚積、沉澱、冷卻了的生活經歷的必然。這種大寫實的價值是厚重的，因為是從某個側面為時代畫像，為侵略者攝下罪證。

楊逵在臺灣日據時期，先後被關押十次。其中最慘無人道的一次，就是他和葉陶準備舉行結婚儀式的那天早上，剎那間喜訊變成了凶相，他們雙雙身陷囹圄。強盜的入侵是他永遠的記憶：九歲時，他常常聽到的是家門外隆隆開過的軍車聲；因不想泡在中學裏聽「皇民教條」和「日本天皇的敕語」到東京當臨時工；接著是在日本和臺灣參加進步的工農運動；然後是學習文學，「想透過小說創作來糾正被歪曲的歷史」^⑤，亡國奴的經歷，革命、文學的實踐給他以生活和藝術的雙面「厚積」，也催生了他文學創作上的「薄發」。楊逵不勉強自己去寫鴻篇巨制，而是巧妙地依託自己在日本打工的親身經歷，通過楊君個體生命的慘酷經歷折射出日據下整個臺灣政治恐怖和經濟凋敝的全貌，收到以小見

大、尺幅千里的藝術效果。楊君及其一家的悲慘遭遇就是日本強盜嘴臉與本質的大寫實：日本侵略者不僅對臺灣施以野蠻的軍事侵略，而且將政治上的卑污、文化上的專制和經濟壓榨緊密結合起來，臺灣人民被推向如磐的黑夜之中。作品以樸素的寫實技法，揭露醜惡，謳歌反抗，角度雖小，筆力深峻，稱《送報伙》為日本「皇民」暴政的大曝光絕非溢美之論。

《四世同堂》是一部包含三部曲的巨作，不僅構思宏大開闊，時空跨度很大，而且內容深刻豐富，人物形象衆多而生動，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小說的獨創性在於藝術構思上，作家巧妙協調了不同的時空量，即以一個淪陷了的北平小胡同為空間，和一個長達八年的時間跨度編織在一起，使小胡同的人生舞臺有了一個動態的社會大背景，各式人等就在這個人生舞臺上演著一幕幕亡國奴的人生活劇。活劇中有各式各樣的民族蛆蟲：他們是見日本人就鞠躬、出賣同胞的失意小官僚冠曉荷；有以當上妓女檢查所所長為榮的大赤包；有雖有文化卻「無恥而沒心沒肺」的祁瑞豐。普通百姓的精神狀態、人生理想也千姿百態：有認為用填滿石頭的大水缸頂住家門就可以把侵略者隔在門外的祁老太爺；有「誰當皇帝給誰納糧」、「有家無國」的麻木百姓，他們「不論是看著一個綠臉的大王打跑一個白臉大王，還是八國聯軍把皇帝趕出去，都只會咪嘻嘻的假笑，而不會落真正的眼淚」；當然，胡同裏也有向國家民族捧出赤心的抗日積極分子：他們是一身正氣的詩人錢默吟；為抗日活動而出生入死的祁瑞全；還有保持高尚民族氣節、以自己的生命同侵略者搏鬥的小崔、小文夫婦、尤桐芳等……。老舍用一系列含恨帶血的故事真切地展現了淪陷區北平的生活場景，讓人感慨、憤恨與警醒。

老舍出身於北平一個滿族平民家庭，幼年失怙。迫於生計，師範畢業後他就肩起家庭生活重擔，嘗盡人間辛酸。抗戰時，他身擔「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總務部主任之職，為抗日救亡